

博物館數碼化成趨勢

科技顛覆想像，也改變了生活方式。以往看展覽、演出，一定要親臨現場，如今身在家中，亦可透過影像或現場直播，參與其中。譬如歐洲歌劇聯盟 Opera Europa 與德法文化電視頻道 Arte，最近便設立網上平台 The Opera Platform，讓公眾免費觀賞直播歌劇。視藝方面，Google 虛擬博物館最近又有新搞作，與本地四家藝文機構合作，觀眾可利用網上平台了解文化歷史。

當數碼化成為藝文機構滲透公眾的工具時，實體博物館亦開始急起直追，嘗試利用數碼科技，搭建多元平台。文物攝影家及博物館資訊化專家胡鍾，擔任故宮博物院攝影師多年，退休前主理的「數字故宮」項目獲國家文化部頒發「創新獎」，改變了公眾對故宮的既定印象。早前他來港分享經驗，適逢周一便是國際博物館日，且聽他道來博物館如何利用新技術傳播知識、讓公眾了解歷史。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數字故宮」主理人胡鍾。

伍麗微攝

故宮博物院的數碼化之路起步算早。1992年，博物館從影像數碼化入手，探索資訊技術在保護、宣傳文化遺產方面的作用，並利用資訊技術將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管理納入科學軌道，陸續展開了各個工作方向的資訊系統建設。博物館乃「以物證史」的地方，裡面的建築、文物均是實實在在、見證歷史之物，然而實體博物館的空間有限，數碼化則無此限制，放多少文物都不成問題。胡鍾說，故宮博物院曾做過一個調查，向訪客了解他們走出故宮後留下的印象，不少人反映地方太大、走得太累，「這是很悲哀的事。」胡鍾感嘆故宮未能發揮博物館的作用，引導公眾了解歷史、文化。

強調體驗

相比其他博物館，故宮的狀況較為複雜，如前文所言，地方過大分散了公眾的注意力，未能有效、集中地展示文物。此外，北京故宮一向予人只保留建築物、欠缺藏品的感覺，胡鍾亦說，「數字故宮」開始之前，根本查不清故宮到底有多少文物，但數碼化後，終於理清裡面竟有三十多萬件瓷器、二十多萬幅繪畫。「北京故宮的館藏其實很豐富，此前商務曾出版了共六十本的《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裡面只涵蓋了一萬件文物。」他強調故宮不只是一個殼，那裡長年陳列了二十五萬件文物，只不過很分散。「數字故宮改變了這種生態。」

他們在故宮配置了多個銀幕，如太和門資訊屏，播放視頻節目。拍攝人員捕捉了故宮的各個細節，

如佈局、建築等，凸顯故宮之美；又從明朝朱棣遷都說起，指他因為在北平生活多年，因而遷址這裡，清楚道出紫禁城的來龍去脈；並且透過風水說、五行說、禮制說等角度，讓大家知道故宮之美、古人之思想。

此外，工作人員又在武英殿、文華殿設視頻放映廳，放映書畫、陶瓷等相關影像。製作人員不是純粹拍攝文物，而是以活潑的方式介紹、反映古董的美態，如在介紹中國書畫時，便用上武術來呈現書法剛健之美，「看完影片，大家可以在博物館裡看到實物。」強調影像與實物之間的銜接關係。

2010年，上海世博中國館展出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後來更移師香港展出，此次展覽亦啟發北京故宮，朝電子書畫邁進。胡鍾說，上海版的電子《清明上河圖》細看有瑕疵，激發他們去做一個沉浸式數位畫卷的「走進清明上河圖」。此項目由北京故宮、微軟亞洲研究院及北京大學共同開發，最初曾考慮以文字解釋畫面上的事物，後來改以錄音來說明，觀眾站在《清明上河圖》的銀幕前，用手觸碰之處，畫面會停住，並有語音解說，可以有效、



廣東省博物館推出的微信導覽系統極為方便，只要輸入文物編號，即可獲得相關資訊。

準確地表達畫面上的東西。

借鑑經驗

胡鍾說，多媒體的運用能夠幫助大家抓住感覺，讓不同文化的人都能夠了解博物館的內涵。數碼化最終的目標是讓未去過故宮的人知道故宮博物院到底是甚麼，讓來過的人更認識博物館，讓站在文物前的人了解背後的文化知識，並在回去後得以回味一切，而不是只記得故宮很大、走得很累。

博物館數碼化是不可避免之趨勢，有看過電影《翻生侏羅館》都知道，一式一樣的博物館擺設不足以讓人駐足細看，視覺化、影像化反而能夠更簡潔地陳述故事、追溯歷史原貌。目前各地不少博物館都開始數碼化工程，甚至利用新媒體推送消息，像北京故宮便使用微博、微信帳號發布消息、推送文章；台北故宮亦開發數位典藏系統，為數十萬件藏品建資料庫，又開發「帶著故宮走」app，並放上自家製



故宮博物院設置了數個視頻放映廳，播放相關影片。

作的微電影《古今穿梭遊》，介紹故宮精選典藏等，好玩有趣；而廣東省博物館推出的微信導覽系統也十分好用，公眾透過微信帳號，輸入館內的藏品編號，即可收到相關圖片、影像及語音介紹，方便參觀者。

「我們是在找出不足之處，並利用數碼技術來填補。」本地博物館不妨借鑑。

下載「帶著故宮走」app，可觀看台北故宮自家製作的微電影。



走東走西

文：余綺平

英國貴族私學

中國人注重子女教育，近年內地富豪爭先恐後地將子女送往英國留學，起初攻讀大學的學士、碩士學位，如今留學生的年紀愈來愈輕，小至十二歲，就進入英國的私立貴族中學寄宿。

最近一本新書名為《校友：私立公學的盛衰》(The Old Boy: the Decline and Rise of the Public School)，講述英國私校發展背景，作者 David Tutner 是《經濟時報》記者，資料詳盡，值得望子成龍的父母參考。

英國最早的私立貴族寄宿男校名溫徹斯特(Winchester)，一三二二年開辦，當時學生八十人，能夠交得起學費者僅十人，餘為家貧免費生。當年創校目標，是替教會培養傳教士。後來因經費缺乏職員銳減，被迫轉面向「公」眾，故稱為「公學」。

伊頓公學於一四四零年由亨利六世國王創辦。到十八至十九世紀，貴族私立公學開始式微。《校友》一書指出，私校的教學方式脫離現實社會，如教授希臘文、灌輸變態的性知識，學生沒有一技之長，畢業後難以在社會謀生。

當時的私校校風敗壞，校方貪污，學生以大欺小，流行同性戀，老師以皮鞭體罰，學生酗酒，曾經因鬧酒而發生騷亂。《校友》指出，一七一零年溫徹斯特私校因配額額而發生五宗暴動，伊頓公學則有六宗。

另一所著名的貴族私校名橄欖球(Rugby)中學，一七九七年爆發騷亂時，曾要求政府出動軍隊鎮壓。該校校長阿諾德進行私校全面大改革，他訓練了二十三名校長，分派進駐各所私校，挽救私校名聲。

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國營的公立學校成績未如



人意，英國家庭若經濟許可，大多送子女入讀私校，貴族私校開始大行其道。數字顯示，全國中學生人數中，私校學生人數由一九七七年的百分之四點四，升至一九八一年的百分之六點二。教學內容亦不再「不吃人間煙火」，老師會教授電腦和普通話。

如今英國貴族私校的外國留學生，大多來自中國和俄羅斯。私校亦努力向外拓展，在外國開辦分校，例如與伊頓公學齊名的哈羅斯公學，早年在香港設立分校，著名的 Dulwich 公學更在內地有三所分校。其他亞洲地方如南韓和新加坡等，也有英國的貴族私校分校。《校友》一書認為，目前是英國私校的黃金時代。

這些私校師資優秀，小班教學，加上一流的學校設施，結果，教出了英國首相、倫敦市長和眾多國會議員等優秀人才。不過，校內出身富貴家庭的學生，因為不愁衣食，前途無憂，他們依舊有許多是「不食人間煙火」。統計數字指出，英國有百分之二十二二的流行歌星，是畢業於貴族私校。這些富家子弟甚少選讀醫科、法律和科學等艱深科目。數字還顯示，畢業於私校的保守黨議員人數，已由一九八三年的百分之七十，減至二零一零年的百分之五十四了。

送子女入讀貴族公學的家長，千萬要小心孩子近朱者赤，得不償失。

深圳城市影像展 定格「福田25小時」

著名作家斯蒂芬·金說：「回憶是內心的謠言」，而攝影是心靈謠言不能翻供的證據。攝影能留住我們認為的美，我們堅持的好，我們確信的真，銘刻我們愛過的人和城。秉持這一信念，深圳在文博會期間舉辦為期三天的城市攝影展，主題為「把生活和人寫進記憶」，活動早前舉行。

據了解，此次影像展由《女報》承辦，共邀請四位攝影師，分別是時裝攝影師楊寒、靜物攝影師鄒晶、人物攝影

師黎德國和建築攝影師歐海春。他們在3天內，完成了以「福田25小時」為主題的拍攝活動，用不同視角記錄了深圳這個城市的人和故事。

活動主辦方介紹，所謂「福田25小時」，是指一天的24小時再加上他們眼中最特別的1小時。每位攝影師最終展出25張照片，共計100張照片。這些照片將分為4個主題，在深圳中心城展出。除展示靜態照片外，活動還將舉辦「HEY! JUMP」跳躍拍攝互動體驗，



黎德國作品 李薇攝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薇

中國作協訪港交流 讚香港文學難能可貴

以中國作協副主席、書記處書記陳崎嶇為首的中國作協代表團一行於5月8日至11日訪港交流，並參加「新世紀香港小說趨勢」研討會，暢談香港文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5月10日晚，香港作家聯會與中國作協代表團舉辦座談會，力圖加強兩地的文藝交流。

當晚，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潘耀明、執行會長陶然、中國作協副主席陳崎嶇、人民文學雜誌社主編施戰軍、小說選刊雜誌社副主編王幹、湖北作協副主席劉醒龍、中聯辦宣文部副部長朱挺等人出席了座談會。潘耀明表示，香港並不缺乏文學，文壇並不荒蕪，金庸等作家組成的香港文學，成就有目共睹。但長久以來，香港社會都缺乏對文學的關注。潘

耀明強調，文學對這座城市彌足珍貴，「寫作是抵抗遺忘的方式」。他又透露，今年適逢金庸創作六十周年，香港作聯將與香港康文署、藝發局等團體合辦「我與金庸」全球徵文獎和「金庸文學山水研討會」。

陳崎嶇則認為，香港文化多元、多彩、平等、包容，自回歸以來，香港作家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對內地文學、作家帶來了多方面的影響。「在物慾橫流、經濟利益為上的環境中仍然潛心創作，這種對文學的熱愛實在難得。」他也希望將來中國作協與香港作聯能有更多的交流合作。席間，人民文學雜誌社主編施戰軍與小說選刊雜誌社副主編王幹就現場向香港作家熱情邀稿，希望日



中國作協與香港作聯舉辦座談會。左起：劉醒龍、施戰軍、潘耀明、陳崎嶇、陶然、王幹、徐虹 尉璋攝

後將更多的香港作品推介給內地讀者。曾憑藉《天行者》獲得2011年茅盾文學獎的著名作家劉醒龍則從創作者的角度說起自己和香港的文學緣分。原來早在1994年，他就曾因為小說改編電影而與香港結緣；2006年，他的長篇小說《聖天門口》亦曾獲得由浸會大學文學院主辦的第一屆「紅樓夢獎」的決賽團圍。劉醒龍認為，寫作的可貴之處，在於它是一種價值的判斷，「在香港搞文學艱難，但也是榮幸——用文學選擇了自己所堅持的價值觀。」 文：草草